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何 萍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源自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经验性理解: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经验性的命题;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因此,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性的阐释。在前一个问题上,要辨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结合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揭示其中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在后一个问题上,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

何 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43007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主要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封建主义化”等谬论^[1]。在研究方式上,采取了哲学史的叙述方式,历史地梳理从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到毛泽东思想创立的过程,在人物研究上,主要关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恽代英、瞿秋白、艾思奇等代表。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时段上叙述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了只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单一模式,从而开辟了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是,由于这种历史叙述的基础并不充分,尤其是缺乏个案研究,所以,整个历史叙述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展开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中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过程。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种种质疑都是针对这种假象的^[2]。我认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上述不足,就必须开展两项基础性研究:一是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澄清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二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

——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胡万年

内容提要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关键词 康德 自由 实在性 隐蔽的循环 理性的事实

胡万年,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210097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然与自由关系的处理,间接地论证了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经验的可能性,而是逻辑的可能性,即概念的可思想性,即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理念,没有任何经验的对象。但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它的实在性却通过实践的原理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说,思辨理性只能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只有在实践理性的领域里,才能解决自由的实在性问题。那么,康德是如何确证自由实在性的呢?根据文本,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简称《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简称《实践》)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在《奠基》中,他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但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实践》中,则通过“理性的事实”直接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一、隐蔽的循环

在《奠基》的第三章开头,康德通过对意志和自由概念的界定,从消极自由(独立性)概念推出积极自由(自律性)的概念。由此,从自由概念推导出道德法则概念的论断:“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1]。通过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的类比,康德得出自由的意志就是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的结论。康德认为,我们把自由归于一般的意志还不够,还必须把它归于理性存在者。因此,自由必须被设定为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对此,康德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第一,“我现在说,每一个只能按照自由的理念去行动的存在者,正因为此而在实践方面确实是自由的”。第二,“现在我断言:我们必须也把自由的理念赋予每一个具有意志的理性存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从可能到实现:康德自由理论的存在论阐释”(10YJA720014)的阶段性成果

道—教—经与孔子“斯文”的结构

陈 贇

内容提要 孔子以承担“斯文”自命,而“斯文”在孔子之前,则是尧舜之道与三代礼乐,其实践的主体为帝王,其实践的方式则是制礼作乐;孔子不得其位,只能以教(具体说就是六经的整理)承担“斯文”,由此而导致了“斯文”的结构变化,斯文具有道、教、经三个层面,合之方能见“斯文”的总体。

关键词 孔子 斯文 道—教—经

陈 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200241

孔子将轴心时代之前的,也就是帝、王时代的政教遗产,称为“斯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

这是孔子在拘囚于匡地、生命面临危险的境况下的自我表白^[2],据此可以想见“斯文”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孔子的终极关切。

一、“斯文”在孔子那里的转义:从礼乐到六经

关于上引“斯文”,孔安国解释说:“兹,此也。言文王虽已死,其文见在此。此,自谓其身。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死后。言天将丧斯文者,本不当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丧也。”^[3]孔安国的解释重点在于文王既没之后斯文集于孔子一身,孔子以一己之身肩负斯文之统为己任。斯文为何?朱熹《集注》云:“道之显者谓之为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江熙亦认为:

“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4]显然,斯文是道之可见者,是粲然可观的礼乐、声名、典章、文物,是帝王时代政教遗产的总汇。形而上地说,是历史中圣贤的实践所彰显出来的道,道之显现就是文。在这个意义上,文不仅包含三代的礼乐制度,而且包含五帝时代的政教实践,只不过五帝的政教被三代“扬弃”,故而以三代的礼乐制度为文,其实已经内在包含对三代及以前的政教文明的总结,而周公则为此政教文明的集大成者。然而,当孔子之世,集上古三代之大成的周代礼乐制度(其兴于文王、集成于周公)已经崩坏,在这种语境下,身负斯文之统就并不意味着以孔子之身以及此身所承载的政治实践推行此礼乐制度,而恰恰是在天下无道之时发明“六经”以保存礼乐制度,虽不能付诸实行,然由其迹以明其道,以其教而承传其道,即便不能当世落实,但其义理及其理想却可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而上升为一普遍意义上的教化体系,从而维持“斯文”于不

以欧亚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性(上)

[美]德里克

内容提要 在现代性反思过程中清理欧洲中心主义遗产,并不意味着转入其他地方中心主义立场,而应从欧亚大陆在现代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入手。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当前的全球状况并非简单地源自现代性早期阶段——即欧洲主导的现代性——的发展,而是包括亚洲和其他地方参与的结果,特别是,在这一阶段上的现代性,直接提出了根据多样的和别样的现代性来否定先前遗产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用“全球现代性”来描述当前状况具有更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既有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反思,提出了以欧亚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性的理论空间及其界限。

关键词 历史叙事 欧亚视角 全球现代性

[美]德里克,美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胡大平(译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93

在《全球现代性》中,我试图揭示当代全球意识的含意,以期理解现代性之构成。在这里,我希望特别指出明朝(1368-1644)的发展,它紧接着蒙古的扩张,后者第一次为从整体来想象欧亚创造了条件^[1]。受这种新的意识激励,历史学家开始推翻过去 30 年来对跨洲互动在“现代世界”形成中作用的解释,过去人们把“现代世界”看作主要是欧洲意图和行动的产物。他者亦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对这一点的承认已经挑战了深嵌于欧洲现代历史编撰学中的假设,即现代性是欧洲历史内部发展的产物——以欧洲中心来组织历史,这便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意义^[2]。转向对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社会关系的强

调,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仍然没有充分面对的复杂问题:对现代性形成的参与为我们理解其他社会提供了何种意义。它们是否也极大地改变了这些互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怎样解释这些变迁?

简单地说,发展是社会内在动力的产物,这是欧洲现代史学的基本假设,它已经成为以欧洲现代性霸权来探讨全球历史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化话语的两个主要变体——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扩散过程中,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民族主义史学中同样如此,后者将民族视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假设激活了全部的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伊斯兰中心主义。

论当前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关信平

内容提要 在最近十来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逐渐提高,但社会发展不仅仅需要有足够的投入水平,而还需要有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我国过去社会发展缓慢,不仅仅是因为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不够,而且还因为社会发展方式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在提高投入的前提下,还需要转变社会发展的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也会是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行动体系,它要求决策者、研究者和全社会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机制创新等各个方面都行动起来。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含义和意义;在对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以及在社会发展的理念、体制、资源分配、运行机制等方面转变方式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 社会发展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体制 机制

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300071

一、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含义和意义

在过去 30 年里我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相比之下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进展缓慢(洪大用,2007)。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辉煌成就以后,加快社会发展的议题已经提到我国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过去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都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问题,以各种方式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投入的经费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新的

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应该如何推动社会发展,迄今为止却讨论得并不充分。在反思过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时,人们比较多地集中在强调政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视和投入不足。(徐月宾、张秀兰,2005 等)确实,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严重不足确实是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仅靠政府的重视和足够多的投入也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就会取得理想的成果。在政府投入增加的情况下,还需要有合理的目标、体制、机制和资源运行方式,才能够保证社会发展能够合理有效地

本文系 201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现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研究”(11ASH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国际社会福利改革： 对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启示

徐月宾 张秀兰 王小波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护、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的影响下探索出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工作福利和社会养老金三种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路径,这些改革路径中所包含的投资人力资本、重视劳动力市场在减贫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引入社工服务等做法对我国未来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国际 社会福利改革 中国社会救助 政策

徐月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100875

张秀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100875

王小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 100875

一、不断完善中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出现的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导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在短期内出现了迅速膨胀。在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网已经解体,而传统的农村救灾救济政策又仅仅是在农村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濒临枯竭时才向其提供有限的救助,尽管从 80 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扶贫开发计划已经使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 1981 年时的 2.5 亿下降到了 2000 年时的 3209 万,但所剩余的贫困人口大都因缺乏劳动能力而无法脱贫。

为了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我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市于 1993 年率先建立起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 年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

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于同一时期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试点,并于 2006 年在全国得到推广。现行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城乡家庭提供现金救助,各地的低保标准通常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采用基本支出法或比例法确定。近些年来,这两项制度的支出水平和救助规模都增长显著,到 2009 年全国城乡低保的救助规模已经分别达到 2348 万和 4800 万人,分别占全国非农业户籍人口的 6%和农业户籍人口的 5.5%。城乡低保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支柱和核心。

在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实践中,中央政府通常只是勾画出政策的大致轮廓,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内容和实施细则;在这种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就必须不断进行探索,设

“中国人无所谓自私”

——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

黄家亮 廉如鉴

内容提要 “中国人是否自私”是热议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其中梁漱溟的观点非常独特,他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的合理性,认为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是从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民族自私性问题的,他把中西方社会差别理解为流派之别,不同意中国文化落后的说法,并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理解为文化转向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和其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不能以西方人的行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以西方人行为习惯为标准来评价中国人,因此是一个不恰当的提问。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今日的“文化自觉”、“本土化理论创新”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民族性 国民性 文化发展流派观 阶梯观 差序格局 伦理本位

黄家亮,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100083

廉如鉴,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030006

关于“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的讨论是延绵一个多世纪的热点话题^①。二十世纪上半叶,为了促使民族自醒自救,许多学人不遗余力地揭示出种种民族“劣根性”,如自私自利、和平文弱、粗率马虎、守旧不前、残忍麻木、不平等、不自由等等。其中尤以“自私自利”一条最能刺痛国人的自尊,因为伦理道德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数千年来华夏文明面对各类异质文明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即使在中西交流之初,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对自己在道德方面的优越性仍深信不疑。如果中国人真是自私自利,那么这最后一丝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巨大的文化冲击力,因此它

成为整个学界乃至全社会旷日持久的讨论热点,并形成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另一部分人则决不承认中国人自私。直到建国初期,对这个问题的热议才消退。八十年代后,随着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流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又热烈起来,至今余音未绝。然而在数十年的讨论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常常被人们遗忘:“中国人自私吗?”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

有一个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深邃的文化眼光不仅超越了这场争论中的同辈们,还超过了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眼界——他就是梁漱溟。梁先生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入对比,指出“是否自私”是一个西方文化下的道德设问,移

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的多水平分析

贺寨平 孔 驰

内容提要 社会支持提供的影响因素一般使用传统的多元分析技术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天津贫困人口的随机样本分析进行的多水平分析,探讨了各种因素对提供讨论、经济、就业和社交支持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社会支持提供的影响因素和西方不同,特别是网络层面变量的影响更为普遍和有力,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价值观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 城市贫困人口 社会支持 多水平分析

贺寨平,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 300387

孔 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210093

人们获得社会支持,可以有多种方式:通过政府和慈善等正式机构,或通过朋友、亲属、邻居、同事等关系构成的个人网络获得,或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个人网络给个人提供“网络资本”——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给网络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工具支持、陪伴支持以及信息支持等。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成员(包括贫困人口)维持日常生活、获得新的资源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主要的一种方式。本文主要研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去帮助别人,用多水平分析方法研究提供讨论、经济、就业和社交支持的相关因素。

一、研究背景

在社会学领域一直存在着是社会决定个人,还是个人决定社会的争论,孔德、涂尔干可以说是社会

决定论者。他们认为,社会的客观“社会事实”决定着另外的“社会事实”,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决定关系成为社会学的主要对象,但对于这些客观的结构决定个人的机制却往往缺乏直接的把握。而相反个人决定论者,韦伯则强调个人的特征对于宏观社会的影响。比如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因素,但对于新教伦理究竟如何影响到宏观社会的细节却缺乏细致的探讨。然而,当代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却十分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倾向于强调二者的相互决定,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结构的建构主义”都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等。这种观点得到比较多的认可,但对于社会与个人如何相互作用,也鲜见实证的具体研究。而社会网的研究恰恰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即社会决定个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04CSH010),天津市社科规划课题(TJ03-SR011)“社会资本对城市贫困人口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中青年教师学术推进计划课题,天津师范大学社科研究人才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公共产品的性质与研究重心

李政军

内容提要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但是,(1) 竞争性只与“个人消费”有关,与市场成功无关;非竞争性只与“共同消费”有关,与市场失灵无关。(2) 具有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有主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没有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无主产品。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排他性,而在于它们实现排他性的方式。(3) 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比较实现排他性的方式或产权制度安排的成本差异,而不是单纯地将非排他性与排他性进行比较来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说明。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公共财政理论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公共产品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 产权 市场失灵

李政军,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210093

一、引言

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中,恐怕没有一个术语比 Public Goods 的翻译更让人感到困惑了!就笔者阅读所涉及的中文文献,该术语至少有 12 种翻译,见表 1^①。为了确定各种翻译的使用情况,笔者将这些翻译分别设定为“标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四个子库(即除自然科学以外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库)查找 1911—2010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显示标题超过 100 个的译名,依次递减排列是公共产品、公共物品和公共品。碰巧的是,笔者手边由国内学者撰写的财政学或公共财政学教科书,也只使用了这三个译

名,见表 1。本文试图回答:这三个译名是否准确地表达了 Public Goods 的本质含义?为什么高鸿业最早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时使用的“公有物品”^②、杨君昌^③最早使用、吴俊培^④力荐的“公共商品”、王雍君^⑤和吴强^⑥倡导使用的“公共财货”、于力^⑦、林岗^⑧和杨志勇^⑨建议使用的“共用品”等译名没有得到推广?

译事有三难,达雅信为先。1954 年柯柏年在中央编译局总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经验时指出:“信”就是忠实、正确地传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和精神。“信”是主要的,不“信”就谈不上“达”,“雅”只是“达”的进一步发展^⑩。根据这一翻译标准,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上述译名是否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优化与中小企业成长方式转型研究,项目编号 11CJL025)的资助

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二分法崩溃了吗?

胡 明 方 敏

内容提要 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又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最新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学说所针对的几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学的价值能否中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政策科学、价值问题能否进行理性地研究,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本文认为,不同观点基于不同的动机与观察视角,虽各具合理性,但是如果站在经济学的理论角度,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坚持二分法,而是在于如何坚持二分法,即在实证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在规范研究中应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综合其他因素拓展对规范或价值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实证与规范二分法 价值判断 事实与价值的缠结

胡 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102249

方 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00871

经济学采取实证与规范二分法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尼尔与穆勒^[1],后经 J.N.凯恩斯(提出三分法)和罗宾斯的发展最终成型。它是现代经济学的正统方法论之一,但又是最具争议性的历史问题之一。对二分法最早的攻击来自于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在实证与规范的研究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J.N.凯恩斯于 1891 年提出实证与规范的划分时 also 说道:“我们不仅在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容易把规范性研究同实证性研究搞混,就是在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中,也难以避免这种难堪”(凯恩斯,2001 年,第 23 页,第 34 页)。到了上世纪中期,二分法遭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

尔的批评。他认为不仅没有任何“客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Myrdal,1958.p.134)^[2]。1990 年代,二分法又受到激进经济学、制度主义等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攻击。例如保罗·戴尔·布什认为“在真理应该是什么与真理是什么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Bush,1993,转引自霍奇逊,2007 年,第 25 页),克里夫·彼得认为“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Beed,1991,转引自霍奇逊,2007 年,第 26 页)。在他们看来,要把事实判断(实证研究)从价值判断(规范研究)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不过从总体上来讲,二分法得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文献综述

王 坤

内容提要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三大趋势,并从八个方面归纳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作简要评述。

关键词 区域差异 趋同 趋异 影响因素

王 坤,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010021

一、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趋势的研究

1.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趋同论

Robert J. Barro(1992)认为趋同(收敛)是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落后地区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地区,从而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的现象^[1]。关于经济趋同的研究,最早 Ramsey(1928)指出在新古典框架内对一个封闭经济,如果存在相似的技术结构和偏好,那么区域经济差异是收敛^[2]。从世界经济范围看,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趋同现象也很明显。Baumol(1986)对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9年的实际人均GDP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自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3]。Chen, Jian, and Fleisher, Belton M.(1996)分析了中国各省份1978-1993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发展存在着条件收敛,特别是在物质资本投资、就业率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沿海地区的GDP等方面都存在着趋同,并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正在缩小^[4]。Tianlun Jian等(1996)研究了1952-1993年中国各个省的实际人均收入,结果发现,1952-1965年间,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实际收入并没有出现强收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1978),全国各个省的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1990年以后,尽管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增长明显快于内地,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在沿海各个省内部却表现为趋同^[5]。

杨伟民(1992)对我国1978-1989年间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东、西部之间收入水平的总体差异水平是缩小^[6]。魏后凯(1997)对我国1952-1995年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课题《基于资源型产业集群视角的经济发展形式转变研究》(08CJL005),主持人:王坤;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资源性产业集群升级路径问题研究》(70863001)资助

生产分割、跨国公司与专业化模式：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牟 丽 梁 琦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建立生产分割背景下包含中间投入品的垂直型跨国公司模型、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说明生产分割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专业化模式的影响。模型分析说明，生产分割模式下，各国分别在一体化生产过程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发展中大国更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证检验结果则说明，生产分割的发展和垂直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助于我国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生产分割 垂直型跨国公司 专业化生产 空间经济学

牟 丽，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15123

梁 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510275

一、引言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生产分割这一新型的生产和分工模式迅速发展起来。在生产分割模式下，跨国公司将一体化生产过程的各个区段在空间上分离开来，根据各区段的要素密集度将其配置到与要素禀赋更相适应的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网络，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纳入进来。参与到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国家或地区则通过发挥自身的禀赋优势，专业化于一体化生产过程的某一区段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生产分割的发展引起了理论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众多学者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生产分割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 Long 等（2005）建立了一个贸易模型，分析服务与生产分割间的联系；Amiti（2005）建立了一个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了生产分割模式下垂直关联厂商的区位决策以及对要素价格的影响；经验研究方面的文献主要涉及生产分割对国际贸易模式、对劳动力需求与国民福利、对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对产业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特征的影响^①。

在生产分割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 Zhang 和 Markusen（1999）和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2007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产分割框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0SJD790018）部分成果。

基于有限理性的选择性预期 与决策有效性的机理分析

郭新强 盛宇华

内容提要 决策者的决策预期直接影响决策方案的选择,决策质量的高低。在系统分析了经济学、决策学对决策预期的研究成果后指出其不足之处,进而提出选择性预期的观点,分析了选择性预期的影响因素,选择性预期与理性预期的关系,并提出如何把握选择性预期的度而提高决策的有效性,以期对现实的决策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有限理性 理性预期 选择性预期 决策有效性

郭新强,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211167

盛宇华,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210097

引言

决策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人类的成功取决于决策质量的高低,而决策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决策技能的高低。从早期的“博弈”论研究开始,人们经历了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1947)的最大期望效用理论、萨维奇(1954)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到赫伯特·西蒙(1955)的有限理性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预期理论等,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使决策更加有效。对决策方案的选择从最优标准到满意标准的变迁,对决策的研究范式也从规范性研究范式向描述性研究范式转化,但贯穿于这一系列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决策研究者都无法回避,那就是决策主体的决策预期问题。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对决策主体的决

策预期都加以关注,但关注的程度和研究的角度并不一样,特别是决策者的决策预期对决策方案选择的有效性,哪些因素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预期,什么样的决策预期才能提高决策的有效性等问题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探索。

一、研究回顾及评价

1. 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

经济学中第一个使预期在经济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期在凯恩斯的早期著作中有一定的地位,但到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则变成中心地位,他对就业水平、货币需求等的分析都主要取决于预期。但凯恩斯并没有明确说明预期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他的论述也是假设性和零散性的,后来的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系

基于财务分析法的中国汽车 企业竞争力研究

华兴夏

内容提要 财务信息是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的综合反映。本文提出基于竞争性情报的财务分析方法,并对中国汽车公司建立基于财务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给出了中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排名。最后,有针对性给出中国汽车企业竞争策略。

关键词 财务分析法 竞争策略 中国汽车 主成分分析法

华兴夏,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44

一、引言

本文介绍了企业竞争情报中的财务分析法的国内外研究状况,通过对中国汽车公司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具体的财务信息分析对比,说明了财务分析法对于企业制定竞争策略的适用性和重要性。以中国汽车企业的财务信息作分析,从多角度进行对比研究,给出中国企业竞争力排名,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财务情报。从企业财务信息的情报化到利用其辅助企业制定竞争策略,系统阐述了财务分析法的运用。

二、国内外关于财务分析法的现状综述

1. 国外相关研究评述

1900 年美国托·托马斯·乌都洛提出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概念。后来,作为财务状况综合评价先驱

者之一的亚历山大·沃尔,提出了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把若干财务比率通过线性关系结合起来,用来评价企业的信用水平。他选择了七种财务比率(流动比率、固定资产比率、产权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所有者权益资本周转率),分别给定其在总评价中所占的比重,总和为 100 分。然后确定一个标准比率,并与实际比率作比较,评出每项指标的得分,最终求出总评分,这就是沃尔评分法。沃尔的评分法从理论上来说,有一个不足,就是未能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七个财务比率,而不是更少或者更多,或者为什么不选择七个别的财务比率,又或者如何确定每个指标所占比重的合理性。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1919 年,美国杜邦公司发明了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用于对权益报酬率的分析。通过将权益报酬率分解为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及资产周转率三个指标,

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

上官酒瑞 程竹汝

内容提要 解释现代公共生活建构中的政治信任“悖论”，需要分析政治信任的结构。根据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的方法论，政治信任结构可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属于政治信任的硬核，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则属于保护带，它们在整个政治信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由此构成了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原理，对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政治不信任的修复能力，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政治信任 政治制度 政治价值 公共生活

上官酒瑞，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 200233

程竹汝，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 200233

引言 公共生活建构的政治信任“悖论”

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良善公共生活的建构不仅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合作与支持，需要形成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现象。如果说政治生活是在竞争与合作为主轴的现代社会中展开的集群行动，那么无论合作还是竞争都需要在场者和参与者的彼此信任，至少需要在竞争规则方面达成共识，信任并遵从规则。达尔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要自由地聚集起来以便实现他们的目

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相互信任。”^[1]相反，如果民众频繁地表达极端怀疑和不信任，势必侵蚀健康的政治机体与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说，优良有序的政治生活必定是浸润着信任的公共生活。

然而，诉诸经验常常会发现，民众的政治怀疑和不信任充溢于社会政治领域。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不信任更为常见，甚至说不信任更像现代社会的常态。这样的政治不信任通常有政治心理、话语或行动三种表达方式，如政治冷漠、政治谣言、政治怨恨、政治不合作、游行示威等。西方政治发展表明，公民的政治怀疑和不信任构成其重要传统，正可谓：“对政治的质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2]巴伯总结认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转型与重构：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10YJC810038）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建设研究”（09AZD00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解读： 三种理论的比较

朱海英

内容提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作普适性的理论阐释。比较多党合作制政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对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解释,可以发现多党合作制实乃中国的宪政结构,在现实的情景变化中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协商民主理论拓展了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价值,特别是一些协商形式与协商民主有相似之处,但是政协组织自身的局限性和协商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与协商民主的主旨大异其趣。法团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协商制度,把它视作一种职业、行业团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更符合中国现实的利益结构分化的需要。

关键词 政治协商制度 法团主义 协商民主 多党制

朱海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430072

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当下发挥的巨大作用,使我们越来越关切一个问题,即在世界的政治文明话语中,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它的普遍意义或者理论内涵是什么?没有这样的理论说明,固守它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独特产物,也许会抹杀它的实际价值。本文试图从已经对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解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政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进行总结,再结合法团主义理论对它重新解释。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而在于通过三种理论比较,去发现最适合中国政治协商结构这一现实的理论解释。本

文的初步结论是:法团主义理论最适合用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协商制度。

一、政党理论与政治协商制度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象由国民党转变为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即当时的“第三党”,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来自科技、教育、文化、经济、医疗等领域的一群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我们从当时各党派的人员构成可以证实这一点。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但是各民主党派的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政治协商的程序化研究”(07CZZ005)和作者参与的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团队项目“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本土化及其超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十七大以来关于党内民主若干问题的研究述评

王 跃 王 磊

内容提要 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问题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本文对这一时期党内民主研究的若干新进展进行述评,以期推动党内民主问题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十七大 党内民主 国外政党 历史考察 风险

王 跃,南京师范大学思政部教授 210046

王 磊,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210046

中共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问题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本文拟对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研究的若干新进展作简要总结,以期推动党内民主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以人为鉴:学界关于国外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研究的新进展

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重点对国外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国外政党为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求,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提高党员民主意识,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健全党内选举制度,充分体现和反映广大党员的愿望;完善党内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相关制度,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的范畴;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发挥基层组织联系民众的作用;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探索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模式等^[1]。

魏伟通过对国外主流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考察,总结出国外主流政党关于党内民主的主张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强调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扩大“民主”内涵;发达国家主流政党普遍强调党内生活多元化,主张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的民主理念受外部影响较大,有些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些主张奉行“西式民主”,也有些党结合国情、党情推行“可控”民主。关于这些政党加强党内民主的具体做法,魏伟总结有:赋予党员更多的民主权利;革新党内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实行集体领导体制;推动党内决策民主化;倾听选民呼声,密切联系群众,以及将严肃党纪与加强党内民主并举等^[2]。

柴尚金重点考察了国外共产党创新党内民主制度的探索。他指出,国外共产党应对新挑战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发挥党员主体作用为重点,构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制度体系;以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为突

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论我国现行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

章正璋

内容提要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具备真正连带债务成立的全部实质要件,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该债务为连带债务的债务。以是否具有相同的发生原因、是否具有意思联络或目的之共同、是否具有负担部分及追偿权作为真正与不真正连带的区分标准,无法正确地、最终地区分真正与不真正连带。我国现行法上存在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直接规定,此外不真正连带债务还广泛地存在于现行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但是协同债务和从属债务并非不真正连带债务。

关键词 不真正连带 概念 原因同一 区分标准 法律效果

章正璋,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东吴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副教授 215006

一、真正连带与不真正连带的区分标准

所谓连带债务(即真正连带,下同),是指数人共负同一债务而对债权人各负全部清偿责任的债务。债权人得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直至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一部或全部清偿,债务人中的一人清偿全部债务时,其他债务人也都对债权人免除责任。作出清偿的债务人有权要求其他债务人偿还其各自应当承担的份额^[1]。连带债务的规定对于债权的实现甚为有利,因为只要债务人之一具有清偿能力,债权的实现便不至于落空。另外,如果债务人分散各地,债权

人可向最近之债务人主张债权,这对于债权人主张权利甚为便利^[2]。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即不真正连带,下同),系由德国法学家米塔斯(Mitteis)和阿依舍雷(Eisele)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按照阿依舍雷的定义,不真正连带是指数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事实分别对于债权人负担数个债务,因一债务人之完全给付,他债务人的债务亦因此而消灭,但是各债务之间无内在之关联,仅仅偶然地服务于债权人同一利益之满足之连带债务^[3]。真正连带与不真正连带的主要区别是^[4]:

1. 真正连带的产生系基于同一个原因事实,而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项目批准号为2011SJB820014)的研究成果

地方自治视野下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制

——基层民主的规范与监督

郭 殊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不正当竞选、选举之后监督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应当在地方自治理论指导下,对我国村委会制度进行重新定位。村委会是特殊的地方自治组织,村委会选举的目的是有效实现村民自治,地方自治理论对村委会选举有着独特的民主要求。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外的地方自治制度,特别是借鉴其对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制度安排、对地方自治团体的监督机制和地方自治团体中居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应当以地方自治理论规范村委会选举,借鉴国外地方自治团体的运行结构,完善村委会选举的程序规范,健全村委会选举的监督机制,并建立司法救济途径,构建我国的居民诉讼制度。

关键词 村委会选举 地方自治 基层民主 居民诉讼

郭 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 100875

在我国,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自治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基层群众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基石,是通往民主政治道路的起点。然而现实中,由于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不正常现象,甚至出现违法违规问题,使得基层民主建设起步艰难,其中村委会选举的失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村委会的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前提。但是,由于实际存在的种种因素,导致基层民主在起步阶段就可能被歪曲,无法真正体现基层群众意愿。本文以基层民主的规范与监督为出发点,借鉴国外地方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

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当前我国村委会选举中问题突出:以河南省甲村为例

河南省某县甲村举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有三位:某乙、某丙和某丁。某乙之前做过村委会主任,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外省有自己的实业;某丙是上届村委会主任,但是以前竞选时承诺的事情都未办成;而某丁亦是本村的成功人士。选举开始之前,某乙承诺一旦当选,立即着手办好三件实事:即装上路灯,铺上水泥路,全村水费全免;某丙借助家族势力,拉拢亲朋好友投其选票;而某丁则是私下向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制”(项目编号:SK111701)的阶段性成果

论我国福利行政的程序完善

马海韵

内容提要 认为福利行政的程序是灵活的、弹性的,是自由裁量的领域的观点,是对西方行政法学理论的一种误读。福利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还是刚性的程序性规定,这一部分内容才是福利行政程序的核心所在。从中国国情考虑,可以在《行政程序法》中单设行政给付程序一节。在立法内容上,应在启动程序、决定程序、听证程序、公开程序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引入依职权启动程序、简易程序和事后听证等新型程序。

关键词 福利行政 行政程序 启动程序 决定程序 听证程序 公开程序

马海韵,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法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 210009

一、何谓福利行政

福利行政又称给付行政,或者服务行政,它是侵害行政或者秩序行政的对称。福利行政与侵害行政最大的区别在于,福利行政是通过供给、保障以及资助等方式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某种利益,而侵害行政则是通过处罚、征收等方式使行政相对人受到不利影响。

福利行政最早是由德国教授福斯多夫在《作为给付主体的行政》(1938年)中提出的。福氏认为,自由人权思想、个人主义、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过去时代(以扩张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法治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基本人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是依赖于新的人权:经济上的分享权。时代已由个人照顾自己的

“自力负责”,转变为由社会力量来解决的“团体负责”,进而发展为由党和国家政治力量提供个人生存保障的“政治负责”。福斯多夫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即:生存照顾(DASEINSVORSORGE)。个人生存所必需而须取用己身之外的东西,任何提供这些取用物者即为生存照顾。构成生存照顾的要件有两个:其一是服务关系的双方性;其二是个人对此等服务关系具有依赖性。政府负有广泛的向民众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唯有如此,才可免于倾覆。人们的生存已经强烈地依赖于行政权力的生存照顾,个人已经无法自行解决生活所需之事物。因而,行政权力必须介入私人生活,认为国家干预愈少就愈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个人生存已经和国家行政密切相关,而且还应该结合得更为紧密。人们依赖国家生存照顾不仅没有羞耻感,反而成为其政治自觉^①。“给付行政”从本质上可以解读为对行政本身负载目的的一

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问题简介

——代主持人的话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610064

二元对立中,对立的两项总是不对称,这个现象很早就被人注意到。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论卷中有长文,其中引魏源《古微堂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正一副。”钱锺书评论魏源这段话,指出此为“三纲之成见,举例不中,然颇识正反相对者未必势力相等,分‘主’与‘辅’。”^[1]他认为魏源发现对立项之间总有不平衡,是很敏感。

用标出性来解释语言学这种二元对立之不平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在给他的朋友雅科布森(Roman Jakobson)的信中提出的^[2]。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的创始人,而雅科布森是现代符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的讨论受到语言学界高度重视。但至今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局限于语言学界。

标出性这个术语,中国语言学界一直译作“标记性”。“标记”的汉语词意义过于宽泛,容易出现误解误用(例如:风格标记,文体标记,标记性建筑等)。西语中也有这问题,marking/marked,都是常用词,容易误会,因此乔姆斯基建议一个特殊术语 markedness^[3]。此术语应当译为“被标记性”,译词过于累赘。因此我建议:这一系列术语的汉语对应词都改用“标出”与“标出性”。“标出”此汉语词简洁而少歧义,而且兼有 markedness 的被动意义^[4]。

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

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关于标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对立项用多用少的规律。

特鲁别茨柯伊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如 p-b, t-d, s-z, f-v 等中,两项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从而“被积极地标出”(actively marked),其结果是浊辅音使用次数较少。因此,特鲁别茨柯伊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检查一下就可以发现:浊辅音的确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个现象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非常恒定地出现,可见其中有不可忽视的规律。

此后语言学家在语言学各个领域中考察研究标出性,已经有大半个世纪之久,在很多语言现象中发现标出性。总结关于长达 80 年的热烈讨论,很多语言学家指出,标出现象混乱,至今理论上难以总结^[5]。有语言学家建议干脆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因为不对称的情况太复杂,原因太多,说不清楚^[6]。

尽管如此,语言标出性至少文献已经极为丰富,甚至困难重重的汉语的标出性问题,也已经有不少研究。但是在语言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研究,似乎文化中不存在标出性,这与前面所说魏源与钱锺书的观察相反。不过语言学难以弄清的问题,在文化研究中,讨论必然更困难。我们尝试对文化标出性做一个符号学研究,不得不重头做起,因此关于文学标出性的讨论,不得不是探索性的。

标出性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只是原因不在形态

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

——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扩展

胡易容

内容提要 标出性翻转是赵毅衡先生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关键命题。对于翻转的成因与机制,似可进一步讨论。本文通过对标出的生成与结构要素的分析,提出了文化标出性翻转的几个规律:文化正项的“被动让位”,文化博弈中“主导性因素转移”,以及“文化试推”的深层动力。进而,本文将它们归纳为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否定与螺旋式演化机制”,并以此为依据回应了对当代“泛艺术化”的忧虑,指出当前的“普遍标出”现象终将发生回归。

关键词 标出性 文化符号学 试推法 泛艺术化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61006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541004

一、从语言“标记性”到文化“标出性”

“标出性”是赵毅衡对语言学学术语“标记性”的新译。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对一个已广为接受的术语进行翻案?对于重新翻译“markedness”,赵毅衡的理由首先是术语使用的便利性与翻译的准确性。他认为,“标记性”这一译名不方便,……且易出现误解误用。其次,他认为标记性与西语中的相应词语对应并不妥帖。乔姆斯基 1968 提出的词是 markedness。赵毅衡认为,此术语应当译为“被标记性”,译词过于累赘。因此他建议:这一系列术语的汉语对应词都改用“‘标出’与‘标出性’:‘标出’此汉语词简洁而少歧义。”^[1]

理论上讲,这一考虑逻辑分明,建议合理。不过,术语本身具有极强的使用惯性,仅从译名本身的合理性扭转整个语言学界的术语使用不易。不过,赵先

生并非决意要就该术语在语言学界来一次“拨乱反正”。他的重点在于,将标记性理论应用到非语言,尤其是文化理论中。他观察到:“至今,标出性研究大抵局限于语言学。……未能深入文化现象,更未能综合成一个文化符号学理论框架。”^[2]

恐怕这才是赵先生未曾明言但更为重要的理由:在文化领域,对异项是通过某种无形的文化压力来进行身份的归类以使之“标出”。更重要的是,该术语开启了标记性理论新的视域——从语言标记问题,推进为文化标出问题。标记性理论的发展可归纳为两个线索:其一是理论自身不断细化完善,并根据不同语言现象自我修正。但该线索发展似乎面临瓶颈;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线索是,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突破,语言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原初的设定,语言问题已经自我演进为“开放结构的、广义语言(含非语言)”的“文化符号学”。这一总体学科

“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

彭 佳 王万宏

内容提要 在“正项-中项-异项”的动力性关系中,中项处于两头受压的位置。正项对中项的压力是受其维系自身地位的要求驱动的,其压力大小与文化的宽容性相关。异项对中项的压力来自于亚文化自身翻转的要求,也来源于艺术对自身“标出性”的追求。在文化的不同层面上,中项的受压情况是不同的。正项、中项、异项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标出性 正项-中项-异项 中项受压

彭 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610041

王万宏,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610041

文化标出性的原因“不在形态上,而在符用上,如果有形态不平衡,也是符用反过来影响形态”^[1]。本文拟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对中项在这一关系中的受压情况进行更细微的分析,并试图找出其受力情况变化与文化发展变化之间的联系。

一、正项对中项的压力及影响

对“正项-中项-异项”这一动力性关系,《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2]一文已经有了相当清楚描述。为行文方便,笔者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在文化对立项中,正项和异项是不对称的,其原因是对立关系里存在隐而不显的中项,它为了不被标出,总是偏向认同正项;但是这一偏向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变化中。因此,对中项的争夺决定着正异项在文化中的地位。既然被争夺,中项的两头受压

就无可避免;而其受力的方向和程度,和文化的变化趋势不无关联。

任何文化中都有其“主流”或“中心”,它们为了维持自身的正项地位,必定会对中项施加一定压力,迫使其认同自身;如果这一压力过小,正项就会对文化失去控制力;压力过大,文化则很容易失去弹性和活力,陷入发展的僵局。正项施加压力的方式通常来说有两种:一是示范性的,通过某一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宣传、艺术作品等对正项进行文化演绎,社会成员耳濡目染,自然会对正项产生认同。古代社会中贵族生活的繁文缛节、神职人员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官方艺术作品对现有文化和制度的表现都属于这一范畴之内。这些方式所具有的仪式感非常重要,它可以激起社会成员敬畏、尊崇、感动等正面感情,从而自觉地遵守现有的文化规范。在现代社会中,对仪式

中国电视剧人物的标出性翻转

王立新

内容提要 从文化的符号三元动力机制角度观察,当下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正呈现大规模异项翻转局面,即:文化三元的中项向异项偏移,电视剧剧情人物正、异项地位置换。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军人剧、家庭剧以及历史剧三大最具典范意义的中国电视剧类为分析样本,力图揭示中国电视剧人物的标出性历史翻转样态,并一探其背后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

关键词 文化三元 标出性 剧情人物 中国电视剧 历史翻转

王立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博士后 100871;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400074

观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谱系,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引起电视学界足够重视的变化是:从文化符号的三元机制角度考察,当下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正大规模呈现异项翻转局面——传统意义上的正项人物地位边缘化,而原来作为对立异项存在的陪衬人物中心化,权重上移。剧情人物的正、异项二元置换正成为中国电视文化演变的鲜明特征之一。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军人剧、家庭剧以及历史剧三大最有典范意义的中国电视剧类^[1]为符号样本,展示中国电视剧剧情人物的标出性历史翻转样态,并一探其背后文化的深层动力机制。

一、正项反转:军人被作为标出性人物

在我国电视剧中,军人剧属于题材意义重大、表现内容特殊的剧种,是最受重视和扶持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许多军事题材电视剧又被称作主旋律电视

剧。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到近年的《潮起潮落》、《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突出重围》、《壮志凌云》、《女子特警队》、《激情燃烧的岁月》、《DA 师》、《军歌嘹亮》、《长征》、《归途如虹》、《最后的骑兵》、《历史的天空》、《八路军》、《亮剑》、《红领章》、《幸福像花儿一样》、《沙场点兵》,中国电视的军人剧创造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记录。

在 1980 年代,军人剧中谱写的人物基本不脱传统英雄形象,但自 1990 年代以后,军人剧开始明显呈现个人的主体性话语空间扩大的趋势,神圣集体意志淡出。就人物正项而言,则经历从正项英雄、常人、带偏执感的人,直至低智士兵的异项反转。以不同时期播出的经典热播军人剧为例:1980 年代《高山下的花环》中,以梁三喜为代表的一批军人基本是有国无家的英雄;1990 年代初的《潮起潮落》,海军军官鲁明宽开始了建立个体之家的努力寻找;1990 年代末的《和平年代》,特种部队大队长秦子雄则始终苦

标出翻转与武侠小说文体的颠覆： 从《鹿鼎记》到《城邦暴力团》

孙金燕

内容提要 被现实常态文化“标出”的“盗”，正是武侠小说文体要展示的“江湖”美学。金庸《鹿鼎记》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分别从“盗”之美学的两个维度的标出项异位——“侠”之观念和“江湖”幻想，展开了武侠小说文体的主题性颠覆以至文类性颠覆。而武侠小说标出项异位所引发的形式否定，最终指向了其自身意义的构筑方式。

关键词 武侠小说 标出性 “侠”之观念 “江湖”幻想 文体崩溃

孙金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610064

1970 年金庸的《鹿鼎记》正式开启了在武侠小说内部“反武侠”的序幕，绵延至 1990 年代末以张大春《城邦暴力团》为代表的武侠“江湖”，企图在所谓“真实”与“虚构”的粗糙夹板里，寻找一个更明白的说法，由此造成武侠小说与此前业已成型的武侠格局的明显相异。

一、武侠小说的标出性：“盗”之“江湖”美学

武侠小说的独特气质，是它在道德架构上颂扬社会文化认同的“正必克邪”的正常美感，却在细节上表达强“盗”美学，即它以叙述被现实世界常态文化“标出”的异项美感而存在。

武侠小说的“江湖”，是现实文化中的“异项”。侠客得民心却不见容于世，它与现实社会得以“正常”展开的平和、稳定的“道”完全背道而驰。除了统治者绝不会承认自己的“上失其道”^①，“没有个性”的文化中项也未必能认同现实中的血腥杀戮。所以侠客只

能隐身于“江湖”，在价值架构上严格遵守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充分伦理化的世界图景，却以艺术形式的细节表现“快意恩仇”的强“盗”美学：“其行不轨于正义”、“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既随时准备“仗剑行侠”、一鸣天下知，又能得到文化中项的欣赏，使其能够“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可以说，“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史评论》），主要也是抚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中项，以艺术的形式将“以武犯禁”纳入文化中项能接受的符号意义范围，化解标出项颠覆文化常规的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的文化背景下，“道”之“正常”与“盗”之“非常”，二者一正一异，其中大量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状态，它们没有个性地处于“盗”与“道”之间，依靠对标出项“盗”的悖离来表达自身，并随着环境的压力而处于不断地此消彼长的动态状态。武侠小说宣扬“异项”美感，所以“江湖”世界里的正项与异项，恰恰是现实社会文化正异项的

论元代江苏词坛

高峰

内容提要 元朝江苏词坛整体而言不如宋朝繁盛,但是元曲大家白朴、少数民族词人萨都刺,以及江苏本土词人袁易、谢应芳、倪瓒等,均填制了大量描摹风景、抒写隐逸、咏怀古迹的词作,并且形成了豪放、清雅各具其妙的艺术风格,显示出词体曲化的创作趋势。

关键词 元代 江苏 词坛

高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王博文《天籁集序》指出:“(白朴)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宋亡,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五十五岁的白朴徙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并终老于此。

白朴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自肺腑流出。在其晚年寓居江苏的词作当中,通过对江南风景的咏叹,尽显其超旷玩世的心性气质。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引述贾仲明对白朴的评语:“峨冠博带太常卿,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赢得青楼薄倖名。”白朴年轻时,曾经有过风流浪荡的生活经历;卜居金陵后,则又放情山水,寄寓人生的情怀。他驻足茅山,沉醉于道观的清幽:“三峰足云气,万壑散秋声。茅君曾此成道,山与地俱灵”(《水调歌头》);流连

京口,遥观大江奔涌,展开丰富想象:“云拥潮来,水随天去,几点沙鸥雪”(《念奴娇》)、“遥想灵官神府,坐阅潮头风怒,万里瞰沧波。浩荡没鸥鹭,喷薄出蛟鼉”(《水调歌头》)。其《木兰花慢·灯夕到维扬》词则描摹出东南形胜“淮吐浪、海吞潮”的雄壮之势。

白朴流连古都金陵,俯仰古今沧桑巨变,颇多孩童禾黍之意,又能寓人生空幻的感触于咏史怀古之词中。例如《水调歌头·初至金陵,诸公会饮,因用北州集咸阳怀古韵》词作开头两句“苍烟拥乔木,粉雉倚寒空”,以雄健之笔写出了六朝遗宫的满目苍凉,“拥”、“倚”两字极富气势。接着,词人追怀往事,感慨昔日的龙蟠虎踞、石城钟阜,如今已成斑驳的历史遗迹,徒然引人产生“慷慨一尊酒,南北几衰翁”的黯然神伤。下片以“新亭”“流涕”寄托作者故国之思,面对着“朱雀桥边野草,白鹭洲边江水”,发出了古今兴废的无穷浩叹。作者把深深的遗恨融入苍茫景物之中,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苏词文化史研究”(07WSB002)中期研究成果

情趣的享乐：西方颓废思潮 在“五四”的一面投影

倪婷婷

内容提要 “五四”文人的颓废书写具有多种特点,其中包括以表现情趣的享乐来消解内心的空虚与绝望。这种看似消极的反应,其实不失为对待个体生命的务实态度,因为其前提是对情趣享乐效用的清醒认知。这些文人的艺术抉择多少受到西方颓废唯美观念的影响,但他们的精神和艺术行为最终仍受制于中国的现实原则。

关键词 情趣 享乐 “五四”

倪婷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210093

相对于郁达夫等人以肉身化的享乐书写去挑战外在的道德禁忌与社会压迫,展现出恶魔主义惊世骇俗的放达特征,“五四”另一些文人如周作人等则以情趣的享乐追求,来排遣内在的精神空虚与绝望,同样具有反抗的底蕴,但却显得较为内敛。他们不以狂放不羁的恶魔面貌昭之于世,只以艺术化的个体性活动作为自我灵魂慰安的凭借。在颓废主义的享乐旨向层面上,这类对情思趣味的把捉、陶醉,与那种被认定散发出“狄卡丹”气味的对本能欲望刺激的迷恋,形态有别,而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异,当属同源关系。

郭沫若在 1923 年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王尔德喜欢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是偏于外部的“生活的艺术化”,而郭沫若自己则倾向于“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的生活”,两者的意思“稍微不同”。尽

管如此,郭沫若仍然毫不犹豫地把王尔德视为 19 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中主张“用艺术来使我们的日常生活美化”的“一位健将”^[1]。对于王尔德崇奇尚怪的举止言行,郭沫若也许未能充分地领悟出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内里,可他对王尔德“生活的艺术化”主张的认同,证明了王尔德在“五四”受到热捧,决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个体行为放浪乖张,以及仅仅沉沦于感官的享受。在自觉到生命的有限、残缺与人的求生意志之间的根本悖逆后,无论是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还是沉湎于情趣的迷感和享乐,都不啻为缓释现实压抑和生命恐惧的途径。而王尔德“把灵魂的真珠投进酒杯中,在笛音里踏着莲馨花的花径”^[2],这种融官能及情趣的陶醉为一体的艺术至境,想必也会成为有着类似心境的“五四”文人念兹在兹的憧憬。

尽管个体气质、情感、经验和趣味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五四”文人在把握生活和生命存在时的不同侧重,那种以肉感快乐的享受对抗外在压迫的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

——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李 玮

内容提要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 歌谣 新诗 文学革命 诗标准

李 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210097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厘清诗和歌谣发生纠葛的最初动因,辨析决定新诗和歌谣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回答新诗和歌谣关系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后新诗和歌谣文体的辨析,可以发现“白话入诗”后,对新诗发展“重音轻义”还是“重义轻音”问题的争辩,与“歌谣”诗体地位的辨析密切相关。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在这一过程中,“歌谣”一词顺应着关于新诗修辞建设的期待,被赋予了白话音韵修辞的内涵。通过参与“诗标准”的辩驳,“歌谣”承接了“白话入诗”带来诗体“音意分离”的后果,指代从诗体中“淘汰”下来的“可歌韵文”的概念,最终由一种“非文体”的民间文学代名词转变为一种修辞体式的文体。辨析歌谣与诗体关系问题,有助于澄清诗体观念、歌

谣观念,揭示语言变革对诗歌、或者说韵文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一、五四时期口语化的新诗标准对“歌谣”的“选择”

五四时期“歌谣运动”的兴起有各种原因,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民俗的和文学的。除了思想变革使民歌的民俗学、人类学价值得到彰显外,文学语言的变革带来的文体价值和地位变动也是民歌,或者说歌谣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就后一方面来说,“歌谣”被认为“可做新诗的参考”。除了思想意境“平民化”的“参考”价值外,“歌谣”在“体式”上对于新诗创作的“参考”价值也得到重视。由此,“歌谣就是诗”的结论通过各种形式的表述得到论证^①。

值得注意的是:歌谣本是口传,很难称得上是具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项目号:10YJA75111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民歌整理与研究”(编号:09JZD0012)阶段性成果

“真实的幻境”与被消费的“怀旧”

——第六代导演的“城市故事”

曾一果

内容提要 2005年前后,《红颜》、《看上去很美》、《向日葵》等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掀起了一股“城市怀旧”的风潮,本文即通过对第六代导演一些文本的分析,考察第六代导演“城市怀旧”的起因,进而考察这些电影城市怀旧的本质,以及随着时代变化所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城市怀旧 个体记忆 宏大叙事 城市传奇

曾一果,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 215123

2005年顾长卫拍的《孔雀》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随后王小帅的《青红》又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奖”,掀起了一股“怀旧浪潮”,其他类似的作品还有李玉的《红颜》(2005)、张元的《看上去很美》(2006)、张杨的《向日葵》(2005)、小江的《电影往事》(2004)。这批导演被称为“第六代”。他们的电影以城市作为表现对象,充满“怀旧色彩”。李宏宇称之为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集体怀旧”^[1]。为何第六代导演有如此浓厚的怀旧情怀,他们的电影与以往怀旧有何不同?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话题。

一、城市怀旧与宏大叙事反思

“第六代导演”指的是张艺谋、陈凯歌之后更年轻的一群导演,包括贾樟柯、张元、王全安、娄烨、顾长卫、张杨和李玉等人,队伍庞大。他们有着共同的

“电影趣味”,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电影趣味差别甚大。

陈凯歌、张艺谋电影取材的基石是乡土中国,他们对城市文明始终持批判的态度。1986年前后的“寻根文化”热潮,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试图在民族寻根的过程中,重建自我的主体性,这个主体就是认同和皈依乡村世界,并以乡土世界来对抗现代城市文明。陈凯歌在谈到《黄土地》时曾描述了他是如何被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所折服:“就在这样的土地和流水的怀抱中,陕北人,那些世代生活在小小山村的村民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民歌、腰鼓、窗花、刺绣、画幅和数不尽的传说。文化以惊人的美丽轰击着我们,使我们在温馨的射线中漫游。我们且悲且喜,似乎亲历了时间之水的消长,民族的盛衰和散如烟云的荣辱。我们感受到了由快乐和痛苦

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860003)和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9YJC860019)阶段性成果,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 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印少云 岑 红

内容提要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关键词 留学生 国民政府 抗日外交

印少云,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221116

岑 红,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221116

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以专心剿共,这一政策遭到了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反对。随后,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继九·一八之后又后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全国各界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涨,迫使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实施积极的抗日外交政策。在这一外交政策转变的过程中,留学生群体(指有海外留学经历及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为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欧美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方面民族危机加剧,另一方面国内各政治派系和军阀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如故。尤其是蒋汪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同时一些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山东的韩复榘和刘珍年之间的内战先后开始。当时,身负出使法国和国联交涉双重任务的顾维钧刚到日内瓦就联合其他几位驻外代表,呼吁团结抗日。10月30日,驻外代表颜惠庆(留美)、郭泰祺(留美)、顾维钧(留美)、莫德惠、施肇基(留美)、刘文岛(留日、法)、罗忠诒(留英)及诸昌年联名通电外交部及山东和四川的军阀实力

本文系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社会发展”(编号:06JJD770014)、徐州师范大学科研基金跨学科重大项目“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09XKXK0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该成果得到 2008 年江苏省“青蓝工程”的资助。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朱蓉蓉

内容提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半官方社团 民间外交

朱蓉蓉,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5123

在抗战时期有相当多的社会团体开展了民间外交活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即迅速活动,“为使国外各地,明了我国态度,和唤起世界舆论主持正义起见,于七月廿二日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同志会世界总会,各国分会促其政府制裁日本,以维护正义而保卫和平”^①。此外,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保卫中国同盟、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国际友谊社,各种中外经济、文化协会等社会团体也都纷纷加入到战时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行列中。其国际反侵略运动协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缅文化协会表现尤为突出。

一、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1929年底发生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各国

局势发生巨变,法西斯势力兴起,世界政治环境也日趋恶劣。到1935年底,世界形势更为严重,在欧洲,德、意法西斯力量已经兴起并快速发展,迈出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在亚洲,日本在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继续向华北地区扩张。而此时,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之责的国联,对法西斯的扩张,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之责任。在此情形之下西欧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为谋反战争,维护和平,恢复国联机构的活力,促进人类之精诚合作,遂觉有强大之国际和平力量及组织,以执行上述使命之必要”^②。于是1936年9月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成立后,在日内瓦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并派人赴各国宣传成立分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奉命抵华后,多方发动,一方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项目编号:08SJD7700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抗战时期中原地区的走私活动

齐春风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原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日方的策动、军队的参与、大后方经济不能自给及严重的腐败行为都对走私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时主要是特权人物参与走私活动,走私输入的物品种类繁多,但纸烟和毒品较多,输出的物品以当地土特产为主。走私区域大致分河区和泛区两个地区,走私的手法五花八门。走私对中原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原地区 走私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10097

抗战时期,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与沦陷区接壤的部分大致可分“河区”和“泛区”两个地区。河区即黄河流经地,在河南境内系从灵宝至开封东。泛区即黄泛区。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抵挡日军的攻势,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淮阳等县至皖北颍上入淮,长约700余里,宽数里至数十里不等,深浅则由数尺至数十丈不等。在此区域内几乎随处可以驾小船渡过。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战时中原地区的走私活动极为活跃,笔者曾在拙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中有所探讨,但仍嫌零碎,本文将做进一步的探讨。

战时中原地区之所以走私活跃,首先由于日军的策动。抗战爆发后,日本设法向大后方走私货物,

其目的在于尽量吸收法币,套取外汇,并抢购物资。1940年5月,驻扎在豫北博爱的日军,对输出到国统区的货物征税,按售价抽5%,伪商会再抽取2%,运出时伪军还要抽税^[1]。日伪“维持会”、“宣抚班”及特务机关对走私商极力联络,如愿提供大后方情报,购货时可减轻货价或给予奖金,以示鼓励^[2]。

不过,自1940年秋开始,日方改变向大后方倾销的政策。如在沁阳,1940年末日军对城内各种货物严禁商人向外贩卖,如布匹由城携带外出,每日至多不得超过1丈,煤油5桶不准出城,糖和食盐每日只准带三五斤,肥皂、纱线、毛巾等,也只准零星携带。沁、孟市面流通的零星货物,是由沁阳商人沟通伪军走私运出,或在夜间越城偷运的。这样做风险极大,走私商有因被发觉而被日军捕获后活剥皮或活埋者^[3]。

日军有时也选择少量物资放出,借以换回它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经济战研究”(项目批准号:07JA770020)的阶段性成果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

——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王 光

内容提要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关键词 梁漱溟 民主政治 思想转变 文化比较 儒学诠释

王 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130012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梁漱溟不仅以其在现代新儒学知识谱系中的鼻祖地位受到重视,更凭借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蜚声海内外。梁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是多年来理论界的一种共识。西学东渐以来,西化的可能就是先进的,固守本土文化应该就是落后的;以西学推进社会的改良或革命基本等同于进步,坚守本土文化似乎就是保守。如果说他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看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与未来时,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显得颇为乐观的话,这无疑是梁氏思想意识中存在某些守旧情结,但以此即称其为保守主义者亦未免太过武断。而且,所谓保守与进步应当放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思考,退言之,梁漱溟的保守主要体现

在文化领域中。他对于公共生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显示出多少保守之意,梁漱溟曾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上,以期实现民族之自强与进步。他不仅对民主精神颇具仰慕之情,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民主或民主政治有其独创性的理论诠释。事实上,梁漱溟对民主的认识随着他思想历程的丰富和完善而逐步深化,这当是梁漱溟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思想历程的三个时期与对民主的态度

梁漱溟本人非常重视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他曾不止一次反省自己对个体生命和外在世界的认识。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

国民塑造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 以修身科的历史嬗变为中心

尚红娟

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中国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修身科应运而生。从臣民的教化到国民的培养,从个人私德的修炼到国民品性的完善,从传统的教化灌输到学生本位的课程教育,在修身科的这一历史嬗变中,传统德育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却未彻底实现,因此在国民塑造上也仅是缺位的启蒙。

关键词 国民塑造 传统德育 近代转型 修身科

尚红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200433

古代中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家族本位、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宗法等级社会,儒家伦理道德是整个社会得以持续稳固的基石。在道德至上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传统的道德教育以“修己安人”为目标,以儒家经典为教育核心,通过教化和训导实现“臣民”向“顺民”的转化。清末,在西学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开始转型:伦理观念变化,教育功能拓展,科举制度式微,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情势下,修身科这一体现新式教育特点的德育课程,作为传统道德教育历史转型的载体,被置于近代课程体系的首位。

一、从臣民到国民:教学目标的转型

清末,修身科的教学宗旨被频繁修订,但“忠君、

尊孔”始终是其核心思想。民国成立后,修身科的教学宗旨开始朝着“完具国民品德”的方向发展。

1. “忠君、尊孔”的臣民在清末的余绪

修身科自1902年正式设置到1911年间,清政府对各学堂的立学宗旨几乎每两年修订一次,在“中体西用”观的支配下,修身科的教学目标仍以教化“忠君、尊孔”的臣民为核心。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学校德育课程正式纳入到国家政策层面。《章程》规定:小学修身科以“古人之嘉言懿行”养成儿童之德性,中学修身科以“坚其敦尚伦常之心”,“鼓其奋发有为之气”,“尤当示以一身与家族朋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1]。1903年《重订学堂章程折》规定:“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思壹归于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台湾公民教育发展与两岸文化认同的研究”(CEA100132)的阶段性成果

晚明南京教案起因再探

——以西方殖民活动为视角

谭树林 张伊玲

内容提要 晚明南京教案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教案。关于这次教案的起因,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耶冲突、晚明党派之争、中西文化冲突等方面。实际上,晚明中外局势下西方殖民活动的威胁亦为南京教案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只是学界迄今仍鲜有论及。

关键词 南京教案 西方殖民活动 反教士大夫

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10093

张伊玲,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210093

一、以往学界有关南京教案原因之检讨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上《参远夷疏》,标志着南京教案的开始。作为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教案,一爆发即引起教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又名谢务禄)作为南京教案亲历者,在其所著《大中国志》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教案全过程,为后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后来的诸多中国天主教史著述,对南京教案几乎均有论及。但对此教案的专门研究,则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张维华依据《南宮署牒》之记载而撰成的《南京教案始末》一文^[1]。此后,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展开对南京教案的专门研究。其中,关于南京教案的起因,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关于南京教案爆发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说法:

1. 南京教案的爆发源于天主教与佛教之争。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南京教案当事人曾德昭,他认为沈淮反教与佛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争论有关。这一说法影响深远,此后几乎所有关于南京教案的研究中,都一再重申这一观点。的确,由于利玛窦确定了“补儒易佛”的传教政策,从而导致了天主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辩论,使得天主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大批佛教徒改宗天主教,由此给佛教带来了资助与信徒的流失,使得这种矛盾更为激化。

2. 明末党派斗争导致南京教案的爆发。这种说法首先由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提出^[2],其后不少研究者加以阐释^[3]。持此说法者认为,以沈淮为首的反教士大夫大多来自浙党,而东林党中有很大部分人对天主教持友好态度,因此南京教案被看作是浙党与东林党斗争的具体体现。但是,持此说法者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东林党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天主教,作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王永平

内容提要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关键词 晋孝武帝 司马道子 司马元显 宗室 寒士 寒人

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225002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门阀政治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高门士族垄断军政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虚弱的司马氏皇权则回光返照。孝武帝依重其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以其执掌军政大权,形成了司马氏皇权以相权辅助皇权的政治格局,其目的是巩固皇权、排挤高门士族。一些追随司马氏皇权的人物也深受鼓舞,积极进言,希望孝武帝、司马道子乘势有为。晋孝武帝之强化皇权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之专断朝政,对以往执政的以陈郡谢氏为代表的高门士族的有所排挤与压制。不仅如此,孝武帝、司马道子在与高门士族的斗争过程中,为了巩固、扩大其统治基础,他们还有意识地提携、依重其他的社会阶层与势力。随着皇权的强化,在高门士族阶层之外,一

些新的社会政治势力浮现到历史的前台,成为司马氏皇权操弄政局的助力与工具,其中主要有宗室、寒士与佞幸“近习”。这些新的政治群体、社会阶层的兴起,起初皆作为皇权的附庸的形态出现,有的还受到传统史家的妖魔化的描写,历来受到漠视,但从当时社会与政局变化的角度而言,颇有深入分析的价值与意义。

一、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以强化皇权

孝武帝加强皇权,首重宗室,其弟司马道子之执掌相权,正是如此。《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十年八月谢安死后,军政大权悉归司马道子;十一年四月癸巳,“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尚书左仆射,谯王恬为尚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革》(项目批准号:10YJA770054)的中期研究成果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徐艺乙

内容提要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手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使有目的的造物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民间物质文化的进步。一般情况下,对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能够便利生活,同时也要求能够美化和丰富生活,不同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类型手工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手工艺及其产品创造的多元化。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由此创造出庞大的民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 历史文化 民间物质文化 知识体系 传承

徐艺乙,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10093

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在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者是批量制作、大量生产,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者是拾遗补缺、修旧利废,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特殊需求,或者是精工细作、巧夺天工,以体现某种观念,寄托某种情感。由此,创造出庞

大的民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手工艺的地位及其作用并不明晰,似乎与历史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以及文人都曾经受到经学传统的熏陶,他们所信奉的是“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1]之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多不屑一顾,偶尔记上一笔也是以此来说明其他,或是趣味猎奇。其实,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

江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探讨

李传殿

内容提要 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同时还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突出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然任重道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本文在对江苏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工业化 产业优化升级

李传殿,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3

经过多年的发展,江苏省经济社会迈入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互动并进的新阶段。江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目前,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仍将是“十二五”期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本文对此作一分析探讨。

一、江苏产业结构现状

1. 江苏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江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三次产业结构

2005年至2009年,江苏人均GDP从24952.96元上升至44473.93元,而同期的产业结构及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结构依然都是“二、三、一”的格局。三次产业结构由8.0:56.6:35.4变化为6.5:53.9:39.6,第一

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自2005年的最高峰的56.6%开始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但第二产业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变化趋势与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7.8:38.5:33.7变化为19.8:44.8:35.5,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第二产业逐年增加,第三产业稳步增长。

根据陈佳贵等人的研究,江苏和浙江、广东同处在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而京、沪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1]。

(2)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化

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62.8%、1.8%、15.4%、15.1%和4.9%调整为2009年的59.9%、1.8%、15.7%、17.6%和5%。纯农业(种植业)比重明显下降,渔业比

江苏省农作物秸秆资源 能源化潜力与区域分布研究

李太平 徐 超

内容提要 农作物秸秆是一种潜在的生物质能源,合理开发利用农作物秸秆生物质能源,对缓解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江苏省农作物秸秆为研究对象,运用草谷比法估算了江苏省秸秆资源量、可能源化利用量、能源化潜力,分析了江苏省秸秆生物质能源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研究表明江苏省2009年可能源化利用的秸秆约为1889.82万吨,折合标准煤896.53万吨,是当年江苏省农业能源消耗量的2.7倍,而且可能源化利用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量在年度间变化幅度较小。从地域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苏北,苏中、苏南地区相对较少。其中盐城市秸秆资源最为丰富,是江苏省最适宜发展秸秆生物质能源的地区。

关键词 农作物秸秆 生物质能源 区域分布

李太平,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210095

徐 超,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 210095

一、引言

生物质能源是“能源”、“环保”与“农业”高度融合的一种可再生能源,具有碳平衡、低硫等优点,已成为“低碳”时代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也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更加迫切、也更有条件发展生物质能源。江苏省作为我国能源消费大省,2009年能源自给率仅为11%左右,能源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已被列为《可再生能源法》在全国试点的4个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发展

生物质能源为主的省份。而在各类生物质能源中,江苏省秸秆资源量位居全国各省前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农作物秸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江苏省生物质能源发展的重点领域。

长期以来,农作物秸秆作为农业生产废弃物,除一部分用作农村生活燃料和畜禽饲料,其它大部分直接在田间焚烧,不仅引起夏秋两季城乡空气污染,而且造成秸秆生物质能源的浪费。合理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不仅可以变废为宝,缓解能源短缺矛盾,而且可以减少秸秆焚烧和煤炭发电产生的环境问题。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KYZ201009)和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K2010001)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王长恩

内容提要 在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教育公平问题备受人们关注。本文结合相关研究课题,以对教育公平的概念界定,对教育不公平问题及其成因,对教育公平的意义,对教育公平的实施策略与方法,对教育公平研究的现存问题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汇集了众多研究者的观点与看法。特别是对其现存问题从实施机制、教育不公平指责的社会心理诉求、辩证看待教育发展及其不公平现象三个方面阐明了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 教育公平 研究 问题

王长恩,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210046

在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有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并且被周期性地提出来,教育公平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例。每当教育发展面临重大转折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公平的问题就会随着人们对教育目标、教育政策、教育经费、教育法规等问题的关注而被重新提出来,并对引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系统审视我国近年来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教育公平问题和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推进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深入发展,不无裨益。

一、教育公平的概念界定

对于公平的涵义,研究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性质”^[1]。但是,

落实到教育公平的具体界定与论述中,研究者的认识角度或侧重却不尽相同,以致论争、质疑从未间断。就所涉文献来看,研究者对教育公平的界定,主要有“规则性界定”、“权利性界定”、“层次性界定”三种方式。

教育公平的规则性界定方式,是从社会制度及其保障角度来看待教育公平的宏观性界定方式。例如,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即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符合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源^[2]。持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强调,教育公平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相联,并以此为基准,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教育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教育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

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校长的 角色、素质与科学选拔

陈 艳

内容提要 大学校长独特的办学理念、管理才能和个人品格与一所大学的发展和声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立足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科学定位了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理性分析了应具备的思想素质和人文科学素质,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大学校长科学选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大学校长 角色 素质 科学选拔

陈 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225002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著名大学常常是与著名大学校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校长独特的办学理念、管理才能和个人品格往往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由于特殊国情,中国高校在领导者体制上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如何科学地定位校长的角色、明确校长的职责、合理设计校长所必备的人文科学素养,以及把符合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科学选拔到合适的校长工作岗位,既是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实践需要。

一、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当代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家、思想家、实践家克拉克·科尔认为:“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

友,教职员工的同事,校友的可靠伙伴,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能干的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邻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同议会交往的政治家,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同捐款人进行交涉富有辩才的外交家,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新闻发言人,地道的学者,州和国家的仆人”^[1]。也就是说,大学领导者应成为公众和教职员心目中的“全能人才”。但是事实上,就连科尔自己也承认,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所有这些事情。这表明,大学校长的角色具有复杂性、冲突性、差异性、整合性,呈现为多样化的基本特征。综观中外大学校长的角色类型,结合当前全球化时代对大学校长的特殊要求以及中国大学内部领导体制的特殊性等因素,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应体现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批准号:09DJA001),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批准号:09SJB710003)

高校教师学科与教育

——双专业化培训问题与对策

倪敏玲

内容提要 高校教师培训是提高教师素质,改善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创新型人才概念的提出,高校教师培训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提出了高校教师培训——学科专业化和教育专业化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形成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 教师专业化 培训 问题 对策

倪敏玲,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215123

随着我国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发展新阶段^[1],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新阶段的重要工作。高校肩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历史任务和重要使命,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和培养学生的直接主体——高校教师。“名师出高徒”——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一流教师的获得因此成为高校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当前高校进入品牌竞争时代,教授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品牌支柱^[2],引进名师和培养教师是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而培养现有的教师队伍则是中国高校优化人力资源的主要课题和任务之一。教师职业具有(双专业)的性质:一是学科专业;二是教育专业。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既要有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又要通晓教育科学知识,了解教育规律,掌握教学技能^[3]。高校教师只有经过科学合理地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双专业化培训与开发才能成为优秀的一流教师,才能

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本文就当前高校教师学科专业化和教育专业化培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注重教师职业生涯设计,制定师资综合培训方案,树立责任意识、开展多种培训方式及加大培训经费力度等路径,大力培养高校师资队伍,从根本上完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任务。

一、高校教师学科与教育—双专业化培训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改革已从规模型向质量型迈进,从宏观改革开始向微观和深层次发展,高校内部管理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加强教师执教能力,促进师资队伍的建设发展成为高校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教师专业化包括学科专业化和教育专业化^[4],教师专业化培训包括学科和教育双专业化培训内容。在实践中,高校教师学科与教育—双专业化培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顾客自由度： 论广告诉求的同一化价值取向

郑丽勇

内容提要 广告诉求策略存在多种选择,本文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理论,提出顾客自由度是顾客价值的本质内涵,广告的使命是传播顾客价值,因此,无论是产品策略还是品牌策略,它们拥有同一化的价值取向——顾客自由度。

关键词 广告诉求 顾客自由度 顾客价值

郑丽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广告专家约翰·奥托尔(John O'Toole)指出:“广告活动的讯息战略如有错误的话,那么,该活动便不可能成功。”^[1]许多成功的广告人因他们在广告诉求策略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名垂青史。比如,李奥·贝纳的固有刺激法、罗瑟·瑞夫斯的独特销售建议法、威廉·伯恩巴克的实施重心法、奥格威的品牌形象理论、艾·里斯和杰·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或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策略,一是产品策略,二是品牌策略。产品策略强调产品的性能和消费者利益。李奥·贝纳认为成功广告的秘诀在于找出产品本身固有的刺激,发现厂家为什么生产这种产品的原因,以及消费者为什么要购买这种产品的原因。罗瑟·瑞夫斯认为,消费者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好的捕鼠器”。威廉·伯恩巴克认为,有效的秘诀便是抓住问题,然后通过图像刺激来表现诚实可信的产品优点。尽管大家在说辞上不尽相同,但这些方法在本质上

都是强调产品的价值。广告人的职责就是要从产品中发现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利益点,而这些利益点基于产品的客观性能或属性,因此产品价值具有客观性。品牌策略则属于另外一个价值维度。雷克萨斯曾经针对奔驰发布一个竞争性广告:“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这是一个典型的产品策略广告,而奔驰以品牌策略予以反击——“同样的品质,不同的地位”。在美国汽车质量权威评估机构J.D.Power连续多年的测评中,日本的丰田和本田汽车可靠性连续十多年占据前列位置,但日本汽车的品牌价值始终无法与德国的奔驰、宝马等高端品牌相提并论。LV、迪奥等奢侈品品牌的品牌溢价更是远远超出其产品的实际价值,正如奥格威认为,消费者购买的不是产品,而是品牌。产品策略强调产品的客观价值,而品牌策略所传播的顾客价值可能与产品有关,也可能与产品无关。艾·里斯和杰·特劳特认为,品牌“定位并不是不牵涉到改变,它确实地改变。但改变的是名称、价格及包装,实际上对产品则完全没有改变。所